第二十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特别报道

上海爱乐乐团与澳门乐团共同演绎时长近100分钟的鸿篇巨制

中国乐团上海首演布鲁克纳第八交响曲

■本报记者 **姜方**

上海爱乐乐团与澳门乐团昨晚以120人组成的联合乐团，共同奏响交响乐史上著名的鸿篇巨制——时长近100分钟的布鲁克纳《第八交响曲》。布鲁克纳的交响乐作品规模宏大、难度极高，此前国内乐团很少演绎，《第八交响曲》更是其中篇幅最长的一部。昨晚，该作在指挥家吕嘉执棒下完成中国乐团的上海首演，引发音乐界和乐迷的广泛关注。

“要感谢艺术节提供的平台，让我们能一气呵成地诠释这部伟大的作品。”吕嘉告诉记者，布鲁克纳《第八交响曲》不仅相当考验乐团的技术水准，更需要乐手对作品背后的历史文化具备深刻理解，这样的“重头戏”不仅展现了中国乐团日臻成熟的专业能力，也体现了爱乐者们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

翻看本届艺术节的节目单，马勒《第五交响曲》《第十交响曲》、布鲁克纳《第七交响曲》等大部头作品十分抢眼。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顶级乐团愿意在上海演绎大体量的交响乐作品，这一现象在音乐学者陶辛看来，可喜之外更证明了上海乐迷对古典乐的接受容量正在水涨船高。有业内人士指出，这也将倒逼上海本土乐团进一步加强自身水准，向世界发出足以媲美全球一流乐团的中国声音。

上海乐团实力强、乐迷呼声高，大部头交响乐愈演愈频繁

就在不久前，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余隆在紫禁城太庙前挥舞银棒。“史诗级经典《布兰诗歌》整整一个小时的演出转瞬即逝，震撼到无法形容！”有乐迷这样感叹。就在此前的上海夏季音乐节上，余隆执棒上交演出了马勒《第一交响曲》；无独有偶，由张艺指挥的上海爱乐乐团2018–2019音乐季开幕音乐会中，马勒这部被称为乐团演奏水准“试金石”的作品再度响起……大部头、高难度的经典曲目正越来越频繁地被上海乐团列入演出季。

“一般的交响乐通常时长在45分钟，而马勒《第一交响曲》和布鲁克纳《第八交响曲》时长都在70分钟以上，这两位晚期浪漫派作曲家的交响乐对乐团的挑战性巨大。”上海爱乐乐团常务副团长孙红说，大部头交响乐篇幅长、编制大，其复杂的配器和宏大的乐思也十分考验乐手间的默契。“这些作品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才得以普遍演出。卡拉扬首次执棒柏林爱乐演奏马勒《第五交响曲》时，排练就花了整整几个月的时间。”如今，沪上交响乐团选择迎难而上，足以证明其演奏水平相比以往有了质的飞跃。

正是出于对上海古典音乐市场环境、上海乐迷素质和上海乐团水平的信任，吕嘉选择执棒布鲁克纳音乐理念和作曲技法上的“集大成者”——《第八交响曲》。该作分为1887年版和1890年版，亮相此次艺术节的是配器编制更庞大、音乐细节更微妙的后者。吕嘉说：“几百年前的西方经典交响乐之所以能经久流传，有音乐本身的魅力也有作曲家不朽的精神。我试图尽可能让乐团展现布鲁克纳的激情和灵感，哲思与热情。”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上海爱乐乐团完成了布鲁克纳《第六交响曲》在上海的中国乐团首演。从今年起的未来三年内，该团将完成马勒及布鲁克纳所有交响乐作品的演出。

与其他知名乐团并肩排演，提升上海本土乐团整体实力

“中国交响乐团发展要‘两条腿’走路。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交响乐原创作品，努力开创当代交响乐的‘中国学派’是一方面；将西方经典作品演奏好，通过反复锤炼提升演奏水准则是不容忽视的另一方面。”这是上海爱乐乐团音乐总监张艺的观点。尤其是在面临“文化走出去”时，中国乐团演绎的大部头作品若能以高超的技术、具有辨识度的音色和对音乐的深刻理解，满足古典乐文化较为深厚地区的观众的“挑剔耳朵”，将切身提升中国文艺院团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以去年登台瑞士琉森音乐节的上海交响乐团为例，其演奏的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曲》不仅收获了欧洲观众的热烈掌声，还由此开启了上交和琉森音乐节的友谊与长期合作。

与各地乐团并肩排演，上海本土乐团的实力得以在实践中不断增强。今年国庆节期间，由上海爱乐乐团与澳门乐团组成的联合乐团登台澳门文化中心，布鲁克纳《第八交响曲》成功献演于第32届澳门国际音乐节。礼尚往来，同样是在吕嘉的指挥下，两团乐手昨晚再次在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牵手”，以默契的配合与高度专业的演奏征服了到场的观众。未来，两团将开展更多深层次的交流与互动，共同促进中国交响音乐事业的发展。

作为上海爱乐乐团和费城交响乐团共同委约的首次尝试，今年4月费城交响乐团曾派出几位乐手，来沪参与上海青年作曲家龚天鹏新作《京剧幻想》的排练和首演。而在明年1月，由上海爱乐乐团和费城交响乐团组成的百人编制联合乐团，将在美国费城奏响这部时长85分钟、来自中国的大部头作品。届时，有标识度的上海声音将被世界上的更多人听到。

多媒体音乐剧场《长恨歌》将在清华大学上演

■本报记者 **王筱丽**

他是首位向国内音乐学子系统传授欧美近代专业作曲理论的教育家，曾创作我国第一部交响音乐作品，留下了94首包括交响乐、室内乐、钢琴复调音乐、清唱剧等多种体裁形式的音乐作品……今年是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黄自逝世80周年，“致敬大师——纪念黄自先生逝世80周年系列学术活动”今天起在清华大学校史馆和蒙民伟音乐厅拉开帷幕，活动包括专题展、座谈会及音乐会。

黄自字今吾，是中国30年代重要的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1916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开始接触西方音乐，此后前往美国留学，在美国欧伯林学院及耶鲁大学音乐学校学习作曲。1929年回国后，先后在上海沪江大学音乐系、国立音专理论作曲组任教，并兼任音专教务主任，热心音乐教育事业，培养了贺绿汀、陈田鹤、江定仙等近代音乐先驱，是中国早期音乐教育的重要奠基人。

此次专题展分为“黄自与清华”“黄自的音乐人生”“黄自与国立音专”“黄自与当下上音”等板块，分别展现黄自与清华、上音两校的渊源和丰富的音乐履历。音乐会则将由上海音乐学院校史馆“海尚音苑”的本、硕学生、清华大学学生艺术团合唱队等联袂演出。黄自的经典声乐作品如《春思曲》《玫瑰三愿》《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西风的话》等都将一一得到演绎。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下午上音校史馆与数媒学院首度合作，将于清华大学蒙民伟音乐厅带来多媒体音乐剧场《长恨歌》。该作品根据黄自创作的中国第一部清唱剧《长恨歌》改编而成。《长恨歌》是黄自唯一一部大型声乐套曲，内容取材于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同名长诗。此次的多媒体音乐剧场将以新媒体艺术手段的多元化呈现融中国古诗词、西方作曲技法于一体，对这一经典作品进行全新的探索。本次活动由清华大学与上海音乐学院联合主办。

上海京剧院赴京上演《智取威虎山》

本报讯（记者**黄启哲**）“甘洒热血写春秋”，台上台下响起合唱。日前，上海京剧院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上演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场面显得尤为热闹。作为上海京剧院的保留剧目，此次演出由蓝天、徐建忠、杨东虎、严庆谷、胡璇等中青年实力演员共同演绎，留给近2000位师生深刻印象。

1958年，上海京剧院根据小说《林海雪原》，改编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在内容上，一并参考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同名话剧创排作品。该剧气势宏大、场面壮观，兼具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历经岁月流逝，依然常演不衰。尤其是剧中由童祥苓饰演的“孤胆英雄”杨子荣更是成为了几代人心中的经典形象。1991年，京剧院恢复演出这一剧目，舞台上陆续出现张学津、耿其昌、章晓申、何澍、李军、范永亮等几代“杨子荣”，使该剧得以传承并重新获得观众的欢迎，至今已成功演出近600场。同时，该剧极富艺术感染力，唱段脍炙人口、流传极广。

此次演出杨子荣的青年演员蓝天，已是第六代。他能深切感受到这部经典作品在年轻观众中的接受度。就在去年，上海京剧院一段演出视频在各大网络平台热转和讨论，其中一个平台浏览量达近80万人次。视频中台前幕后演职人员在150秒的时间里合作无间，共同完成换景换装、直至演员上场，从容唱完一句“二黄导板”。行云流水的一系列动作配合，引得网友纷纷点赞。

而这也是该剧过去伴随“上海京剧万里行”全国巡演所长期累积经验、不断调试的结果。《智取威虎山》作为巡演项目的主打剧目，不仅走到了杨子荣的家乡，也登上一流剧院。如今已有逾30万人次观看此剧，让当代观众有机会再次领略特级侦察英雄杨子荣的高大形象，也能感受到上海京剧院现代京剧创作的水准。

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舞剧《闪闪的红星》昨晚首演，以创新艺术表达塑造当代红色经典

红星闪闪在历史深处，更照耀今日星空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红色经典与创新的艺术表达相逢，气质昂扬的芭蕾舞剧会是什么模样？存于几代人记忆里的革命精神和当下的舞台审美碰撞，2018年的新作能否成为又一出中国芭蕾舞的红色传家宝？脱胎于经典电影的故事经再造后登陆演艺之都，它能否为城市的红色文化再添一抹亮色？

昨晚，作为第二十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参演剧目，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完成全球首演。大幕开启，如是好奇和期许一一找到了回应。它有超现实的舞剧结构，蒙太奇的视觉艺术和空间意识，塑造出一个既经典又颠覆经典的潘冬子形象。它也有超浪漫的舞蹈语汇，能承载芭蕾舞约定俗成的形式感，亦包容了最新的、全球化的审美。

更重要的价值蕴藏在舞剧编导、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赵明的创作理念里——“我希望这部作品能让红色的信仰、革命的精神链接不同年龄的人，既有‘红星照我去战斗’的一代，也有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在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这样的奋斗精神永无止尽、一以贯之。”

舞台上，漫天火光幻成遍野的映山红，当上海音乐学院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杨学进唱出人们熟悉的主题曲《映山红》时，旋律声声扣紧“潘冬子”的舞步，闪闪红星不止闪耀在历史的深处，它更照耀着今日星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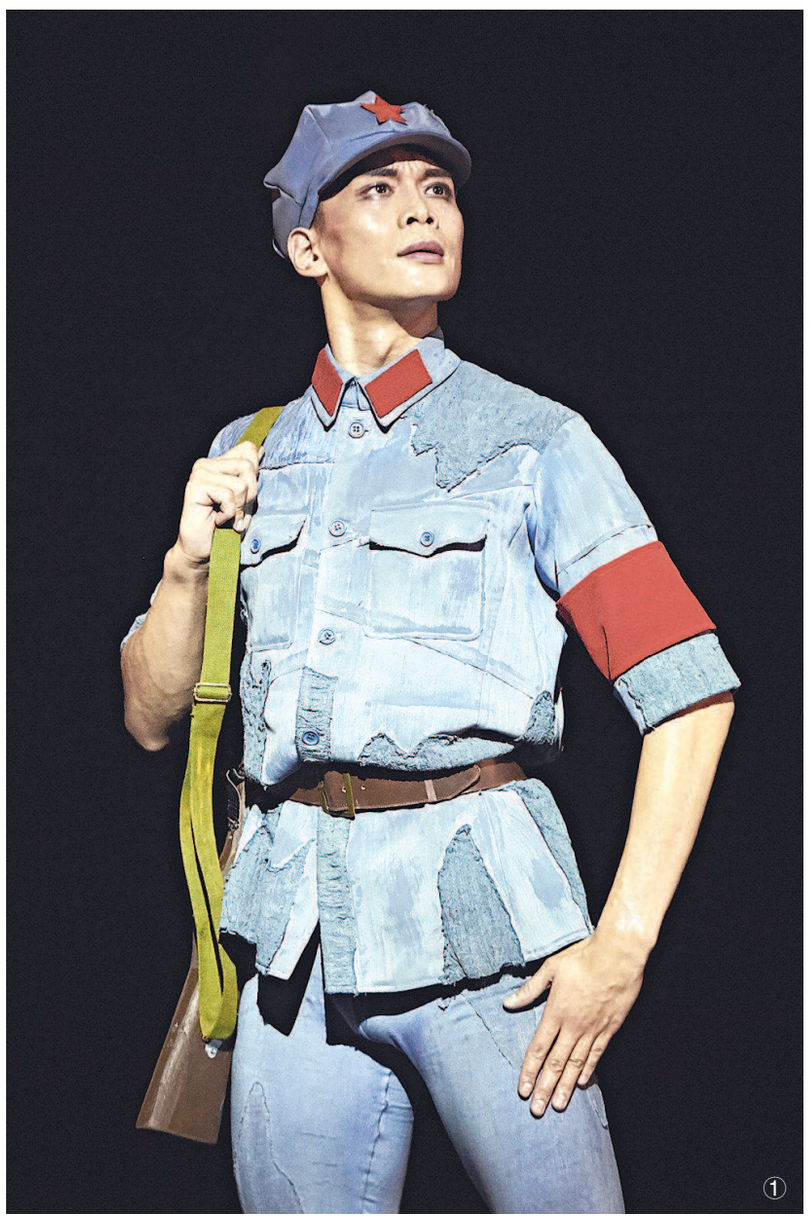
成年潘冬子的视角，亦代入了今天年轻人的体验

赵明已是第二次创作舞剧《闪闪的红星》。隔着20年时间，他坦言：“我把自己对舞剧、对人生、对生命、对革命的感悟和对理想的认识都附着到了新角色身上。”

新版故事的主人公走出观众的熟识地带，从圆头圆脑的少年，改头换面成青年红军战士。现实与记忆交织，舞台上出现两个潘冬子。少年冬子因母亲被火海吞噬而悲伤难抑，成年冬子在行军路上边忆往昔边厘清内心信念。

“舞剧得有故事，但舞蹈不止于故事，它是情绪的铺陈和渲染。这部作品里，少年是青年的影子，两个冬子的内心在对话。”赵明对演绎成年潘冬子的吴虎生这样“说戏”，“起初，冬子参军只是循着父母的志向，要跟红军走、跟党走。随着时间推进，他在红军队伍里逐渐成长，愈发坚定了革命意志和崇高理想。”

最后，舞剧里的潘冬子冲入火海，救起一位位“母亲”，角色的信仰得到升华。吴虎生感慨，每当表演至此，他都会更懂导演一分：“其实是双重回望，既属于青年潘冬子对自己经历的回忆，这个角色也可以代入今天的年轻人，我们共同借着潘冬子的视角去感受那个艰难而光荣的岁月。”



昨晚，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完成全球首演。 ①②由上海芭蕾舞团供图，③由本报记者叶辰亮摄

民族性与世界性邂逅，中国故事能赢得国际舞台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首演之夜，它的创作者傅庚辰老先生坐在观众席上，久久意难平。“熟悉的旋律一起来，我感觉眼眶热热的。”他告诉记者，当年《红星歌》三易其稿，但每一稿都是一气呵成，因为内心总有一股情怀自然喷薄而出。相似的情绪，他昨天也感受到了。上半场临近尾声，舞台上的红五星连成片、红旗飘扬开，伴着《国际歌》旋律一齐涌上来，傅庚辰的心为之澎湃。“这段旋律与舞剧情节、与我们的民族音乐自然过渡、无缝链接，直入人心。”这一刻，中华民族的革命浪漫主义与世界性的英雄主义邂逅，一个中国的红色故事有了赢得国际舞台的可能。

事实上，大胆调和艺术中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在《闪闪的红星》创作中贯穿各层面。比如舞剧里“映山红”“红五星”等意象，都被赋予了人格化表达，充满古典芭蕾的浪漫想象。与此同时，舞台上的红军战士饱含典型的中国阳刚之美。羽纱覆盖的舞裙和笔挺的军装一柔一刚，相得益彰。

“民族样式芭蕾化，中国故事世界化。”上芭团长辛丽丽说，《闪闪的红星》既是革命精神和红色情怀的延续，也是上芭人对芭蕾艺术的传承与创新，更是以海派芭蕾讲好中国故事、打响“上海文化”品牌建设的不懈努力。

中国近代第一份旅行杂志什么样——

茅盾当过主编，张恨水赞其“旅行居家必备”

■本报记者 **李婷**

对许多人来说，出门旅行前都要先备一份攻略。殊不知，早在1927年，上海便有了中国近代第一份旅行杂志，并不间断发行近28年。日前，由上海书店出版社依据上海图书馆馆藏原刊影印出版的《旅行杂志1927—1954》(全71册)在沪首发，为人们重现了这份中国第一“驴友”指南的全貌。

《旅行杂志》的创办人是中国现代著名银行家陈光甫。他也是“中国旅游业之父”，中国旅行社的创始人。陈光甫认为旅行可以开阔眼界、增长见识、产生爱家爱国等美好的情感，还可以吸引外汇、带动国家经济的发展，因此仿效欧美游览杂志，创办《旅行杂志》。

提倡“学术的旅行，旅行的学术”

《旅行杂志》1927年3月创刊于上海，1954年8月在北京终刊。该刊以一年为一卷，初为季刊，每卷共出四期，从第三卷起改为月刊，每卷共出12期。在其存在的20余年间，虽历经战乱和社会变动，编辑部数次迁移，但一直没有间断过发行。

《旅行杂志》提倡“学术的旅行，旅行的学术”，除海内外游记散文、随笔、小说、边疆内地民俗风情的考察及交通信息等外，还刊载了一批经济、文化、史地及旅游等方面的学术文章。刊物在排印、字体与形式等方面仿效了当时中国名刊《东方杂志》，图画文字的质量、封面版式的风格都十分讲究、精心设计。该刊不仅在国内拥有一批高水平作者长期为之写作，而且在日本、法国、英国、瑞士等国还有一批特约撰述记者，出版过《招待所及饭店专号》《留学生号》《建筑专号》《全国铁路沿线名胜专号》《西湖博览会专号》等各类专号，每年正月还刊出新年特大号。

为了招徕读者、增强刊物的文学趣味，《旅行杂志》还发表了为数不少的小说。在主编赵君豪、茅盾等的努力下，该刊物网罗了大批名家撰稿，如罗家伦、郁达夫、张恨水、胡愈之、周瘦鹃、蒋维乔、于右任等。其中，张恨水为《旅行杂志》所写的七部长篇小说中有六部以在旅途中为主要情节来叙述，可视为中国现代早期行走文学的成功实践。

提供了观察当时大众休闲娱乐的文献标本

张恨水既是《旅行杂志》的作者，也是它的忠实读者。他曾写道：“愚读《旅行杂志》，亦有五六年矣，每卷邮到，则置百事于不顾，匆匆展读一遍，以当卧游。而窗明净几，偶作遐思，亦辄于书架上抽取一卷读之，可知《旅行杂志》，不仅为旅行家备之，正亦可为居家者备之。因居家者，旅行未得，可读此书以神驰于宇内也。”据史料记载，当时，《旅行杂志》很是受读者欢迎，创刊第六年即“读者遍及全国，销路远至欧美各国”，发行数量最高时，每期约三万余册。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主任黄显功认为，《旅行杂志》在史学研究上具有多重意义。首先，它为人们提供了观察中国现代社会生活、大众休闲娱乐的文献标本，所呈现的旅游意识与理论思维，可让旅游管理从中获得丰富的文化资源。若从文学的视野来考察《旅行杂志》，它是中国现代“行走文学”的渊薮和孵化器，从游记到小说均有代表性，直接引导了此类作品的创作。从民族学、民俗学、地理学、建筑史、景观史等角度来审视《旅行杂志》，其中的文字和图像为人们留下了已经消失或正在变化中的原始记录，其刊载的广告亦是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生动记录。此外，其所刊内容于今日研究江南文化，也多有裨益。

据悉，此次出版的《旅行杂志1927—1954》以上图馆藏的全套期刊为底本，一期不缺，按照16开精装分装71册，是这套期刊目前内容最完备、印制清晰的影印本。出版社还将所有刊物的篇目另行汇编成总目录并有相对应的页码，便于读者检索。

《旅行杂志》。(上海书店出版社供图)